

关于未来，总是迷雾重重，但《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捕捉“末端小事”，发现掀起未来波澜的机缘。“高和·2049 论坛”致力于从当下的种种，挖掘关于未来的洞见、高见、远见。我们希望与你心有灵犀，一起走向 2049。

导读

特稿 >

如何理解李克强 7-16 讲话？

文 /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李克强亲自澄清了很多人对“克强经济学”的误解

智库 >

城镇化：一个村庄提出的三个问题

文 / 梁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冀中星再次提醒我们，农民工对城镇化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他们才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同时，他们对城镇化提出的问题也许会吓到我们

能源的几个重要趋势

文 / 张国宝 前国家能源局局长

“两次博鳌论坛我都做了大胆的预测，唱反调，很幸运，这两次都被我预测对了”

欧元区危机源有增无减

文 / 张丹红 德国之声经济部高级编辑

过去三年里，欧元区支撑不住的都是小国甚至袖珍国，而且它们是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目前却有三个危机源可能同时爆发

他们到底有没有动力搞改革？

文 /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政府需要等情况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才会做事，否则它不会去做

出品：

高和
中国商业地产基金的领跑者

信睿
Thinker 信睿智库

制作：

《经济导刊》

编辑信箱：

huanghaichuan@citicpub.com

征订信箱

zhangchen@ohighfund.com

预告：

下期《高和·2049 论坛-智库精选》

将于 8 月 15 出品

敬请期待！



特稿 >

如何理解李克强 7-16 讲话？

李克强亲自澄清了很多人对“克强经济学”的误解。预计下半年在继续调结构的同时将陆续会有稳增长政策出台

文 / 管清友

一份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稿被广泛转载，这是近期李克强对经济形势和政策思路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与之前新华社对国务院经济形势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的报道内容一致。此次讲话不是照本宣科，其中案例和数据丰富，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总理本人对经济的一些看法，可以视为一本“克强经济学”手册，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

总体来看，李克强的以下观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政策定调

1. 明确稳增长的态度，增长下限是 7.5% 左右，底限是 7%。李克强再次澄清了之前的一些误读，他指出，“GDP 仍是考核经济的核心指标”，“没有一个综合指标能代替它”，“今年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定位 GDP 增长 7.5% 左右”，但“下限不是底限，底限是经济增长 7%”。李克强还解释了 7% 底限的来历：“确保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GDP 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 6.9% 以上，所以，超越 7% 这个底限是不允许的。”

2. 稳增长不等于刺激增长，只是调结构的前提。政府的政策思路是要减少政策波动，稳定政策预期。在目前经济处于合理区间的情况下，政策重点还是调结构、促改革。

李克强谈到企业普遍反映政策来回摆打乱了市场信号，因此应当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应该是“稳定的、可预期的”。至于框架具体内容，他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即“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点还是调整经济结构，主推的就是释放改革红利”。“但是，如果经济运行逼近或者越过合理区间的上下限，政府就在调结构、推改革中对宏观经济政策作相应调整，更加侧重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就目前来看，经济运行还处于合理区间，虽然“逼近下限”，但“由于还没有越过下限，更没有触动底限，所以当前的政策重点还是调结构、促改革、推动转型升级。”但是，以调结构为主不意味放弃稳增长，因为“调结构前提是稳增长，没有稳定的增长，调结构就没有基础”。

3. 就业仍是政府最关注的变量，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他强调，“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只有经济增速不低于 7.2% 时，才能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 左右。“2008 年、2009 年曾有过一次压力测试，当 GDP 滑到 7% 以下时，就业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尤其是“当时有一两千万农民工返乡”。

4. 既能调结构又能稳增长的措施是总理最为青睐的，推进起来会更快。李克强表达了对这类措施的高度认可，还特别举了下放审批权的例子，预计未来这类措施仍会成为改革次序中较为靠前的考

此次讲话不是照本宣科，其中案例和数据丰富，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总理本人对经济的一些看法

在目前经济处于合理区间的情况下，政策重点还是调结构、促改革

虑，推出的速度会更快。前期简政放权的迅速推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总理点名的重点措施还包括：促进光伏产业发展、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信息消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等。

二、未来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具体措施

和加入WTO一样，BIT谈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长期来看，可能会产生和WTO一样重要的影响

1. 投资仍然重要，但要注意投资方向。要增加投资，重在增加薄弱环节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和铁路投资、节能环保设施建设可能成为重点。李克强认为要投资到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的地区，有利于调结构。从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东部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很薄弱。从领域来看，李克强特别强调了两个，一是铁路投资，指出铁路里程即使到“十二五”末期，也只有美国现在的一半，仍有很大空间；二是节能环保设施，包括地下管网、污水治理和垃圾焚烧等，不一定是政府做，可以通过BOT引进民间资本。

2. 以财政贴息方式为基建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吸引民资进入。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李克强也给出了明确的措施。比如铁路投资，财政适当给予贴息保证铁路投资收益比存款利息高一两个点，然后吸引社会资本大量进入。

3. 培养信息消费等新消费增长点，启动消费。汽车这些传统的产业有瓶颈，会造成环境问题，我们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比如信息消费，“我国信息基础设施还很薄弱，特别是4G技术开发才刚刚起步，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信息产品已经大量投放市场，而我们国产的产品还没有跟上。”结合此前新华社发布的关于信息消费的通稿，中央对信息消费的关注可见一斑。

4. 稳定和扩展外需，扩大开放。进口下滑预示着未来出口也有压力，可能会适当放缓人民币升值过快的步伐，同时增强通关便利化、降低出口检验检疫费用。在近日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正式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BIT)谈判，这意味着中美BIT将很快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潜在的收益包括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倒逼国内经济的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提升FDI的规模和质量等；潜在的风险包括跨境资本管制将被迫放松、投机资本的波动将加剧、BIT的国民待遇条款会冲击现有的BIT体系等。和加入WTO一样，BIT谈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长期来看，可能会产生和WTO一样重要的影响。

5.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改革是核心。新四化必须同步发展，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李克强强调三点，一是棚户区改造，目前“还有一亿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在棚户区里，要破解城市二元结构，必须加快棚户区改造”；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的农民工有两亿多人”，未来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刺激他们的消费；三是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的规模化和企业化经验，推进农村水电入户等基础设施建设。

6. 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要向中西部倾斜，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要继续加大。

7. 开放和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开放是调整结构的重要方面。我国服务业供给不足，潜力很大。李克强特别强调了医疗，保基本，放开非基本。这是对服务业开放定了调子。

8. 深化改革。李克强强调了几个重点：一是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等办法，通过创新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工程建设、重点区域开发；二是研究出台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促进产能过剩行业的消化；三是抓紧推出价格改革，特别是资源性产品和环保收费价格等方面的改革。

进口下滑预示着未来出口也有压力，可能会适当放缓人民币升值过快的步伐，同时增强通关便利化、降低出口检验检疫费用

总体来看，李克强亲自澄清了很多人对“克强经济学”的误解，也印证了我一贯以来的观点：“克强经济学”一定是稳健的，均衡的，不是激进的，休克式的。预计下半年在继续调结构的同时将陆续会有稳增长的政策出台。稳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相辅相成。正如李克强所说，“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李克强提到的棚户区改造、信息消费、节能环保、地下管网建设、铁路投资等领域值得关注。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4c8160101d268.html）

智库 >

城镇化：一个村庄提出的三个问题

冀中星再次提醒我们，农民工对城镇化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想象，他们才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同时，他们对城镇化提出的问题也许会吓到我们

文 / 梁鸿

城镇化谈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人，所以我就来谈谈城镇化过程中人的问题。最近四五年我一直在做调研的工作。不管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都是更多地关注人的层面，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当然，背后会涉及到城镇化的制度等问题。

下面，我重点选择西安、内蒙古和青岛这三个城市的梁庄人，谈三个层面的问题。

梁庄人在西安——“暴民”如何产生？

我在西安受触动最大是我的堂哥们讲的打架和抢劫。打架是什么情况呢？打架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生存。比如说他们用三轮车拉客，这条路要收三块钱，那两块钱行不行？不行，就得三块钱。这样一个过程中就容易产生冲突，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有口舌之争，然后变成实际的战争。战争往往是他们觉得市民看不起农民工：你比我有钱又怎么着呢？打起架来，都是砖头、铁链子，随手拈来的一些东西，都是会负伤的。而打架也分前后方，前方男人在打架，后方女人们赶紧把三轮推到隐秘的地方，因为怕打架后警察一来把三轮车收走。这种场景听起来觉得非常匪夷所思。我们在大街上见到的三轮车，往往符号化，一个风景，我们并没有进入他们内部的具体的日常生活。我的堂哥还说，即使公交车都要欺负他们，本来公交车走得好好的，看到他们也要把他们挤到路边，然后开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经常趁其不注意，拿着棍子去把公交车的玻璃给砸了。

这是一种抗争。农民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一种自己非常脆弱的生存空间。

大堂哥还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就在我去西安前几天，他的车被没收了，我去的时候他的胳膊还肿着，因为戴手铐的时候他进行了反抗。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脾气非常火爆，车被扣时反抗了。通常他们都是通过托儿来要回车，开始他准备给托儿五百块钱，但是那个托说，不行，老梁（大堂哥）你态度太差了，得多些。最后大堂哥说：“我给你一千行不行？”因为那个车值两千多块钱。几天后，托儿回话：“老梁真的不行了，因为你的态度太差了，人家想惩罚你一下。”于是他的车要不来了。这下大堂哥着急了，就给二堂哥打电话，二堂哥又打了几个电话，于是呼啦啦来了五六十个三轮车，大家把马褂一脱（马褂脱了就是不想让别人认为三轮车夫闹事）。他们分乘三辆面包车到交警队示威，我大堂哥喊：“你们这些人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语倒置。在他们心中，不是一个普通民间的案件，而是跟政府完全是两个个体的对立。他没有把权威想成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非常愤怒。我就在想，农民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力呢？

他只能通过非法的方式，就是进行非法的抗争，因为示威在中国是非法的，是闹事，是滋事，而打架更非法了。

这样一群人，一群鲜活的、活泼的、具有内在完整性的人，在交警、城管那里

如果一个城市需要这样一群人，我们就容纳他存在，尊重他，给予他一个基本的空间，这群人也会很好地慢慢融入的。但是我觉得，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容纳，尤其在这样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因为它是恶性循环的），很难去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这一点形成了中国
牢不可破的阶层之间的屏障

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农民，是一个三轮车夫，他们可以随时把这群人扭在地上。这完全是一个对立的风景。我在西安看到了农民是怎样变成一个暴民和恶民。实际上打架也是恶性事件，它又是怎么样变成暴力事件的？在什么样的规则下，什么样的运动之中变成这样？农民是不是天生就是这样一群不懂得规则、素质低的人？

我们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其实从来没有把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分子进行制度性容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官员说西安要坚决取缔三轮车，因为他们严重妨碍了群众的通行，他们严重妨碍了西安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形象。这句话看似非常简单、随意，但是谁是群众，谁有资格在城市道路上通行？这是特别值得思考的。很显然，这群三轮车夫没有被包含在群众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包含在我们通常的“市民”这个层次里面，我们所谓的农民变成市民其实是没有实现的，因为农民，尤其是中年农民来到城市里面只能从事这样一个低层次的工作。并且三轮车夫也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工作来对待。工作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是没有高低之分，而农民工没有尊严，他们没有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存在。我想，如果一个城市需要这样一群人，我们就容纳他存在，尊重他，给予他一个基本的空间，这群人也会很好地慢慢融入的。但是我觉得，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容纳，尤其在这样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因为它是恶性循环的），很难去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所以经常我们听到有人说三轮车夫素质太差了，这是一个现实，他并不是一种完全遵守城市规则的人。我们并不是把这个结果写出来，而是要尊重历史的一个轨迹。所以我想通过这两个故事来让大家思考，这样一种制度的互动，一个制度的排斥，怎么样塑造“农民”。

还有一个案例，有一对父子，父亲非常开朗，每次我给他们拍照，他都不断在那摆姿势，非常自嘲，开朗和自信。但是他儿子却坚决不看我，脸霎一下红了，那一刻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他觉得非常羞耻，当时我觉得很震动，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么羞耻？就因为我穿得好吗？就因为我手里拿个相机吗？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观望，有一种相互的观看，这种观看特别特别重要。我们每个人在对方眼里面都是风景而已，他看到我是一个象征，不是我个人，即所谓城市的象征，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的被压迫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互为风景。我觉得这一点形成了中国牢不可破的阶层之间的屏障。我进行了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种障碍呢？我代表一种市民的象征，代表一种比他高的象征，我们这群人平时对他不好，总欺负他，不然他不会这样子的。当然这似乎有点太绝对了。但在日常的风景区里面，我们看新闻、报纸，看各种各样的塑造，农民都是呼天抢地。矿难中呼天抢地的，给了一点钱，为表示感恩就下跪，讨薪讨来了赶紧下跪感谢，房子没有拆下跪感谢，房子要被拆下跪求情。这种下跪的风景在历史中不断闪现，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下跪意味着身份的不平等，意味着这两个人格是倾斜的，你比我低一层次，而制度的高高在上，昭然若揭。所以这个小孩呈现了非常多的一种我们社会内部制度和内部人对他的塑造，那种观看是非常重要的。

在规则和惩罚、羞辱之中，
农民变成暴民和恶民

在规则和惩罚、羞辱之中，农民变成暴民和恶民，我们今天讲要搞城镇化，在城市的规则和规划里面是没有考虑到这群流浪的农民的，而如果没有规划，他们就变成流浪者了，游荡在城市的缝隙里面。

我引用了2012年印度小摊小贩状告政府的事件，印度政府要搞一个运动会，就占了小摊小贩的地，他们后来就打官司，法院判小摊小贩胜诉，原因是，小摊小贩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基本生存的权利，他们是被容纳的，是可以被规划的。也就是，不管什么小摊小贩，城市不见得那么威严。

我们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今天我们讲城市化的时候想的是超大城市，有高级会所，高档商场，欧化建筑等所谓的主旋律，但是这种主旋律的大道式的东西背后忽略了我们最普通的、最卑微的那样一种存在，它不平民化，不人民化，它一点都不亲民。我觉得这实际上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同构的，它是一个威严的城市，不是一个人的城市。每一个大的商场建构背后一定有驱逐存在。前年台湾地区有一个事件，有一个居民不愿意搬迁，后来政府要去拆迁，很多人去支援那个居民。欧美更不可能暴力拆迁。我们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考虑到平民，更没有考虑到农民，他们来到城市几十年，实际上已经成为居民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我们所有大的空间都被所谓的中产阶级占据了，普通的民众是没有空间的，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这样的空间存在。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城市规划有很大问题。

梁庄人在内蒙古——家族模式 vs 城市模式

内蒙古有一个核心词语叫“扯秧子”，我觉得极其有味道，显示了一种混杂的状态。

农民怎么来到城里面？在内蒙古，我发现他不是简单的依靠招工，很多人比如说你来到城里面，你的老婆来了，你老婆的弟弟也来了，你老婆的弟弟的老婆也来了，于是乎，这一大家子远亲近亲都来了，来了住哪呢？都是在一个出租区，出租的城中村，或者是市郊，要么是私搭乱建的一个小棚子的地方。这样就成了某个城市里的“小梁庄”。

他们之间也吵架，甚至也打架，也爱恨情愁，相互纠缠着撕不清楚。比如说你是他二舅，可以调解这个纠纷。这个二舅一出这个小梁庄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就是一个所谓沉默的、麻木的打工者，他早晨咣咣当当五点钟开始进城打工，但是晚上他回到城中村里面，回到小梁庄的时候，一下子活过来了，他以二舅的身份主持公道。他进到城像死过去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来到城里面就是挣钱而已，在挣钱过程中，彼此的尊重并不是非常的必要，他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你就是一个一般的民工嘛，我让你干吗就干吗，没有任何的情感的存在，没有任何内部逻辑的存在。只有回到小梁庄，他又成了二舅。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在老家村庄里是被特别别人特别看不起的，他到了城里的“河南村”，依然被别人看不起。因为那个河南村大部分还是老家一起来的人，农村那个熟人社会结构整体移植到这个地方来了。

农民在城里面到底怎么生活，他内部的精神逻辑依靠的是什么？还是熟人社会那一套

所以，农民在城里面到底怎么生活，他内部的精神逻辑依靠的是什么？他依靠的还是熟人社会那一套，依靠的是那个关系网络才有生存之感，才有存在之感，才能获得尊严，或者还被人看不起。

那么他跟城市怎么发生关系呢？就是非常简单的钱的关系。他好象来到城里面来了，但是他整个身心并没有依照城市那套结构来，尤其是文化结构，我们说文化结构不像制度结构，文化结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熟人社会来完成。包括卖菜的摊位，老乡特别抱团，因为他必须要抱团，因为你不抱团就被欺负，你被欺负没有人来帮你的。所以经常会说中国社会多么落后，那个又是老乡会，又是什么，反过来你再想，如果没有老乡会，一个农民依靠什么来证明他“在”？我们说这个“在”是责任的“在”，这个城市没有给他存在的感觉，只有这样一种老乡的东西给他一种存在的感觉。这个存在的感觉被认成跟平等的需求是一模一样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最可怜的农民说只要我道德好，别人会尊敬我，他觉得他在了。

我觉得这样一种混杂的状态是我们今天巨大的现实，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一味的忽略，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是忽略这个东西的。这不是少数，包括城市里工厂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还有年轻的黑社会，为什么呢？他们之间是有认同感、安全感的。

我们的楼越来越大，道路越修越宽，越来越豪华，但是我们人到哪去了

即便是他们和房东之间，大家长年累月相邻而居，但依然是两个相隔的社会。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就是钱的关系。比如有段时间北京“河南村”的原住民非常愤怒，说都是你们这群出租者把我们河南村治安秩序弄坏了，把我们环境弄坏了，把我们这个那个弄坏了，但是他们赶他们走吗？不赶，因为他们需要这群人租房子。这样一种现实结构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考虑的话，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随着我们城镇化的不断扩张，比如说河南村马上就要拆迁了，整个河南村包括周边的至少可能有十来万人吧，这群人到哪里去呢？还有北京的唐家岭被拆了，说太影响形象了，现在变成一个特别好看的地方。但是唐家岭百万“蚁族”到哪去了呢？我一个堂侄说，到了唐家岭后面一个村庄，也就是说，唐家岭的拆迁跟这群人也没有关系，他变得离城更远、更艰辛了。那我们这个城镇化到底为谁城镇化呢？我们的楼越来越大，道路越修越宽，越来越豪华，但是我们人到哪去了？人更加艰辛了，更加被城市拒绝了。农民并没有融入到新的生产之中，他们不是工人，也没有工作的感觉，他们在这工业的基地之内讨生活，但却跟工业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是如果这群人只是被裹挟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动，没有精神的变化，没有实际的变化，那跟城镇化之间还是格格不入的。

还有，“扯秧子”非常特殊。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以及非常交错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的寄居点是一个非常大的有机体。他们相互之间是有关系的，相互之间是有人伦、伦理的关系的，这个伦理是是非常密切的一种血肉关系构建的，你很难把它拆开。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农民变为市民？怎么样用城市的结构重新渗透到这里面把他解散掉？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解散掉？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有机体，把它变成优点，来重新思考我们城市的包容性？

熟人社会在城镇里面完全存在，作为利益的一个生存体，有效的支撑农民的在城市的生活和生存的建构，相反当他们走进市区，马上就变成一个沉默麻木的风景，完全是因为我们一个视野和视角的问题。

我们该如何思考这种有效性，家族模式和城市模式有没有融合的可能。实际上熟人社会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精神共同体，它是一个心理基础。今天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呢？就是因为我们心理基础坍塌了，原来我们的社会是有心理基础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底线，比如你不能随便欺负老幼残弱，你不能欺负那些好人，这是基本的，是一个共同的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心理基础，但今天我们心理基础被打乱了。不仅是一个信任问题，一定是我们心理基础没有了，我们彼此之间不信任了，这个不信任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生存共同体千百年来的建构才构成的，但今天这个心理基础在晃动。今天我们拆迁这么快，我们听到农村很多矛盾跟拆迁有关，一会跟拆迁队的矛盾，一会跟政府的矛盾，还有家族内部的矛盾，因为利益突然被推到最前方，每一个人都突然产生巨大的振动。

熟人社会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精神共同体，它是一个心理基础

梁庄人在青岛——工厂伦理

在青岛，我进了一家工厂做调查。我是偷偷进去的，进去后也偷偷逃跑了，也没有拍照。我猛一进去觉得蒸汽太大了，有种颗粒质感，一下子就堵塞了，但是我的老乡们通通都没有戴口罩，他们在我周围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每个人都安之若素，非常平静的工作。那工作倒不是很累，因为他们把氢化物融在液体里面，然后放入铜、金、银什么的，再把饰品放进去，但氢化物一点点就会致人命的，是剧毒的东西。我出来以后长吁一口气，问我堂叔，你怎么都不戴口罩呢？他说只有新

工人才戴口罩，因为那工厂里面空气非常潮湿，戴口罩时间长了根本呼吸不上来。那种戴口罩的窒息感我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种艰难，他们慢慢在习惯，慢慢在接受，融进去了就无所谓了。所以我堂叔就说，人家是要咱命的，咱是要人家钱的。就是拿命来换钱。

我的堂弟就是在青岛这个地方去世的。他是走在工厂的路上，突然就倒在地上了，因为是在路上，不是厂房，所以迅速的把他送回县城，过了两个月就死了。他死得非常惨，我觉得他完全是氢化物中毒，因为青岛大部分是电镀厂，电镀厂是高污染的行当。我后来了解了氢化物中毒的症状，也跟他一模一样。我在《出梁庄记》青岛那章写了很多无名死亡。实际上很多人是中毒而死，但是很少得到赔偿。因为都不是在厂里死。工人必须死在厂里才有可能得到赔偿，这太匪夷所思了，但在那很正常。

现在，我堂叔和他的老婆还在青岛打工。我这个婶子原来特别漂亮，是私奔来我们村庄、跟我堂叔自由恋爱的，但生活折磨着她，因为她的大儿子淹死了。所以我一直想到青岛看看他俩在那的生活。孩子没了，我婶子受打击很大，但在青岛从来没人从这方面来关心她，我堂叔更是不敢提旧事。后来她才开始怀孕。她身上胆结石，不停拉肚子，后来才终于生了她的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很寂寞。

我堂叔说，他们在的是一个大厂区，好几家电镀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至少有两千对夫妇，但只有一对夫妇的孩子在这里跟他们生活，那就是他的小儿子。堂叔说，那是因为大儿子死了，他去求情耍赖才行的。堂叔是老熟练工，在那工作了十年。那个老板说行，你就在这吧。后来其他人如法炮制，那个老板说：滚，我才不理你呢。为什么呢？工厂都是需要加班的，因为你八小时制只能挣到一千多块钱，所有工厂都是按国家最低工资工资标准（目前是 1250 元）给，没有一个工厂八小时给你发两千多块钱。所有工厂的基数如果你一天干八个小时，一个星期休一天班，你一个月只能挣到 1500 块钱。你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获得你作为一个基本家庭、基本人的生存的报酬的，你必须加班。而孩子上幼儿园五点就放学了，只好放在门卫室里面，但安全谁来保证呢？所以那 1999 对夫妇的孩子全部都在老家。

我们留守儿童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工业化急速发展之下，我们这群工人没有任何机会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我们经常说农民进城挣了不少钱，但是他付出什么了呢？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更不要说抚养他，教育他。这种剥夺，这种赤裸裸的剥夺我们是特别需要思考的。我们只埋怨的制度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样一种反思应该包含每一个人，包含着工厂，因为工厂有大工厂小工厂，有大老板小老板，没有一个老板想，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得利阶层，都应该反思这种状况。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提要求，认为这是农民工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城市的问题。这是城市结构里面小的问题，但是是非常本质

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提要求，认为这是农民工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城市的问题

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把它归结为农民工的问题，我们就把问题推远了，把它推向乡村固有的矛盾了。这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

起码，这是一个基本工厂伦理问题。你应该把人当做一个完整的人看待，他有家庭，他自己工作完应该干净的回家。西方也有淘粪工，也有清洁工，人家工作完之后回家也可以弹弹钢琴，也可以看看书，非常尊严的一种生活。但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了呢？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工人作为一个人。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工作，他不是机械理念，不是一个打工者。“打工者”“农民工”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坏的词，因为一看就把他们当成是一个机器的部分，作为某一个异己的存在，不是这一片风景本质的存在。

当然，跟在西安拉三轮车的农民一样，工人在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也会反抗。比如，一个韩国厂用老板的中国情妇做管理，原来他们厂需要十几个工人，情妇来了之后，

只让变成八个工人，并且一个大的引风机坏了她不修。引风机坏了很重要，就是我们说的排风扇，整体空气不排出去是不得了的，所以她简直拿命不当事，月末还说省了四千七百块钱。后来一个工人把铜板弄坏了，本该只罚一点钱，但她一下子扣了一千块钱。结果这个工人是一个小头目，就说，我们把这个铜板偷了，一块铜板可以卖七八百块钱，大家分了。所以，我把它叫“匿名反抗”。他用什么来得到正义呢？也是非法的手段。这是一个巨大的潜流。

他们为什么不去告状，不去工会呢？工会形同虚设，另外他们去告过状，但相关部门把他们推回来了，后来韩国老板知道了，请了黑社会把带头的人打得半死不活，让他滚出青岛。

这个匿名反抗也是现代化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词语，这群人是个不安定因素，因为它积恨太大了。你不要以为农民或者工人就该忍受你的剥削，因为他是人，他会反抗。南方很多反抗，包括那些罢工的、砸厂子的都是一种反抗。

所以，我们应该反思，正常工作是否应该包含一个人完整的生活，工作条件是否应该包含人所应有的基本的尊严。

另外，电镀厂污染是非常大的，也会被反映，但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不但没被赶走，还在官方的帮助下三年换一个名字。政策规定，外企三年以内可以不收税。这样，国家税收没了，居民的生活和环境也没了，而后者是不可逆的。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
本文根据其在“高和-2049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能源的几个重要趋势

“两次博鳌论坛我都做了大胆的预测，唱反调，很幸运，这两次都被我预测对了”

文 / 张国宝

粮食、水、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活资料，能源同时还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人类历史上的用能结构变化曾经极大的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代替使用了几千年的秸秆生物质能，人类社会才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因机器的使用开始大量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也只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迅速的发展起来。飞机、轮船、汽车、互联网等等使用新能源的技术大大的缩短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些都以

现在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只是欧洲的二分之一，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是亚洲的四分之一

先进能源的使用和先进能源的开发相关联。也深刻的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在这样的现代社会当中生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石油等化石能源，世界会怎样。

我今天大胆对几个趋势问题探讨一下。

一个是油价的走势，到底油价以后还会涨还会落？我想可能谁也猜不对。总体来看，近几年世界经济受欧债危机和美洲危机的拖累，增速在放缓，能源的需求并不旺盛，增长速度在放缓，能源的增长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是近几年能源新增最主要的消费国。

同时，美国页岩气革命已经影响了世界能源的事务，美国页岩气的产量去年达到了 1800 亿立方米。我 5 月刚去过美国，问了一下，现在美国的气价很低迷，每百万英热单位 4 美金，已经比年初涨了两个美金，但跟我们中国来比是非常低廉的价格。现在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只是欧洲的二分之一，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是亚洲的四分之一。

日本由于福岛事件的影响。我们中国也多少受点日本的影响，所以我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大体上在每百万英热单位 16 美金到 18 美金。现在像南方电网多少还占点便宜，因为中海油搞的这一批是便宜的，还能挣到钱；而中石油和中石化后来进来的天然气那就挣不到钱，是亏损的。

后来中海油从卡塔尔买了一批气，发改委调了一下价，也就一块来钱，实际上这个价格是亏损的。所以现在亚洲成了世界上气价最贵的地区。

影响油价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供需的基本面，现在油价是面临着下降的压力，因为需求并不旺盛，并不支撑每一桶油 100 美金。但是另一个“地缘政治”，以及产油区的不稳定，以及金融资本的炒作又成为推高油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两种因素的博弈使得现在油价在 100 美元一桶徘徊，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一桶 154 美金，后来迅速下来，去年的年初一桶高到 120 美金。所以两次博鳌论坛我都做了大胆的预测，唱反调，都认为油价应该下来上不去，很幸运，这两次都被我预测对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每桶 100 美金的价格面临着继续下行的压力，这是我的观点。

第二个关于气价，刚才提到美国天然气气价今年 2.4 美金每百万英热单位，大多数的文章都在热烈赞扬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毫无疑问，美国的页岩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它去年的产量（1800 亿立方米）就高于中国全年的天然气消费量（1400 亿立方米）。但是由于出现了供大于求的问题，在美洲大陆气价非常低，这么低的气价实际上是难以维持。实际上在美国天然气革

现在像南方电网多少还占点便宜，因为中海油搞的这一批是便宜的，还能挣到钱；而中石油和中石化后来进来的天然气那就挣不到钱，是亏损的

命下面，所有页岩气生产商普遍亏损，这是现实，所以这已经导致了过去几年美国钻井数量下降了 75%，今后还将继续回归到正常的价格，所以在两到四个美元价格上是很难维持。

《第三次工业革命》大量讲到互联网技术和能源融合的问题，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设想

另外很多人都在探讨从美国进口天然气，因为它太便宜了。美国的天然气生产商，页岩气生产商也在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批准他们向天然气价格高的地区出口天然气。到目前为止美国能源部只批准了两单出口天然气的申请，而且都是向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地区来出口。中国很多厂商也在跃跃欲试，探讨从美国进口天然气。我利用去美国的机会也到美国近几年已经建成的十几个天然气接收站考察参观过。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天然气接收站，它是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在天然气革命让大家认识之前，美国是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中东，特别是卡塔尔。但在出口方面，美国不具备马上建成基础设施的能力，即便在两三年之后由于美国诸多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很大改观，是否他有能力来大量的出口天然气这也要打个问号。所以，两到三年内美国的页岩气不足以影响世界天然气的供需状况。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大量讲到互联网技术和能源融合的问题，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设想。假如说这种能源网今后能够实现的话，那就必须通过转换为电力形式来传输和使用。

现在电力在整个能源结构的比重一直以来都是上升的，一次能源当中过去只有 40% 左右转换为电力的形式来使用，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接近 60%，今后这个比例还将继续增加，而且将成为衡量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们可以想像，我们这个年龄用过蜂窝煤，后来用了天然气，现在天然气都不想用了，现在都拿电烧开水、煮米饭，因为电非常方便，也安全，包括交通运输工具，刚才我提到的化石能源，汽油、柴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交通运输工具改用电。

最典型的例子火车，还是我们这个年龄，50 年代我们坐的是烧煤的蒸汽机车，到了七八十年代我们用的是烧油的内燃机车，而现在普遍用的是用电的动车组，我想这将来肯定仍然是铁路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的公共交通现在大量的使用地铁，实际上是在用电来运送大量的旅客，这个趋势也仍然会继续。

虽然电动汽车现在还没有能够大量的进入社会，但是这一趋势我们已经看到，我相信用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今后个人用的汽车也有相当部分会以电为动力。

还有，人们谈到互联网，谈到手机都把它归类为微电子，弱电，实际上错了。这个是我们耗电的大老虎，云计算和手机，不包括你每天回家充电，就是光是数据库现在就是我们电的最主要的用户。

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光联通这一家公司一年缴的电费就要 100 亿，这个钱不包括你手机自己去充电，这都不算，就是他维持数据库短信信息这些组成所消耗的电能就有这么多。所以互联网社会看似微电子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消耗能源越来越多的一个领域。从这些判断，我认为今后的电力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空间。

目前全世界还有 14 亿人没有用到电，中国也有少量的人还在无电地区，我们已经下决心来解决。但是就是现在我们的电力结构、我们的电力转换、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关于美国的能源独立，这也是一个话题。实际上美国能源独立的口号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机的时候提出来的，到现在为止它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12 年美国原油的日产量提高了 100 万桶，2013 年在这个基础上又提高了 80 万桶。

在美国天然气革命下面，所有页岩气生产商普遍亏损，这是现实，所以这已经导致了过去几年美国钻井数量下降了 75%，今后还将继续回归到正常的价格，所以在两到四美元价格上是很难维持的

2012年原油进口减少了44万桶，今年上半年最新的数据，美国第一次出现了国内生产量大于进口量，也就是说他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低于50%。但是它要做到完全的能源独立并非一时。美国作为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国，海外需求在减少，它必将影响到国际市场的供应和价格，这也就是我认为油价现在仍然面临着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不是能源就不值得投资了呢？据我观察，能源仍然是吸引投资最重要的领域，能源结构的调整将创造出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包括我们要进行的电网的改造和建设。风电“弃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电网不配套的问题。根据粗略的统计仅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至少需要2万亿元以上，我估计我的数字非常保守，因为国家电网公布的数字恐怕都比我这个多。

这是巨大的挑战，但也是巨大的商机

另外，现在储能技术还没有达到完全适应的技术，为什么现在电动汽车拓展不开，是因为电池还没有达到理想，现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除了出现弃风，送不出去以外，我们基本上建的电站都没有储能机构。我现在还担任了美国最大跨国公司一个顾问，我参加他们几次讨论，他们在南美建了电站，一般都配2万千瓦的储能设备，里面装的实际上就是电池。

按照“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末非化石能源要达到11.4%，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还要以更大努力发展风电、水电、太阳能等等。

另外留给第13个五年计划，也就是我们对国际社会庄严宣布的、我们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要达到15%的目标，后面还有6%的任务。这是巨大的挑战，但也是巨大的商机。

（作者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欧元区危机源有增无减

过去三年里，欧元区支撑不住的都是小国甚至袖珍国，而且它们是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目前却有三个危机源可能同时爆发

文 / 张丹红

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 ----- 过去三年里，欧元区支撑不住的都是小国甚至袖珍国，而且它们乖乖地排队，一个接一个。目前却有三个危机源可能同时爆发，而且这三个都有前科。

目前最危险的是葡萄牙。该国的财政和外交部长 ----- 两位内阁的核心人物因不愿再为备受争议的紧缩政策负责而相继辞职，使里斯本政府摇摇欲坠。葡萄牙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8%，明显超出 6% 的预警线。后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将长期

实行低利率政策为投资者吃了定心丸，也为葡萄牙解了围。

换句话说：葡萄牙将需要
第二套救助方案

不过央行的效应维持不了多久，一旦里斯本政府解体，葡萄牙将再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重新选举需要时间，很难想象新政府将痛快答应继续走节约开支的路线，与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谈判因此将艰巨而耗时。

但不管谁当政，一方面出资人的要求无法违抗，另一方面里斯本政府也确实别无选择。如果经济衰退下去，葡萄牙明年的负债额度将达到 GDP 的 140%。本来对这个南欧国家的救助计划将于明年年中到期，可是没有人相信里斯本政府一年后能够在金融市场独立融资。换句话说：葡萄牙将需要第二套救助方案。

这样的局面似曾相识，并让我们自然过渡到欧元区的第二个危机源：希腊。国际出资人处理这个欧元危机发源国的套路我们已经熟悉：三驾马车专家每三个月去雅典实地考察一次，每次报告的结论都是该国没有完成“家庭作业”，但同时肯定雅典在努力、在进步，最后咬牙再给希腊人一次机会。

这一次也不例外：欧盟财长会议刚刚决定向雅典分期发放下一批总额 68 亿欧元的紧急贷款。用不着三驾马车的专家，雅典政府自己不久前已经承认，无法完成公营部门的裁员计划，私有化的速度也不尽人意。总额 2400 亿欧元的两套救助方案和一次私人债务减计没有给这个地中海国家带来曙光；相反，希腊经济连续六年下滑，债务额度今年又将达到 GDP175% 的高峰。国家仍然是入不敷出。出资人设定的到 2020 年将债务额度降至 110% 的目标越来越不现实。

很多专家认为，希腊难逃第二次债务重组，而这一次，德国纳税人也将直接蒙受损失，因为希腊国债的 80% 已转入公共债权人之手。选战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德国怎么能允许希腊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添乱。但 9 月大选一过，希腊问题就会提上议事日程。尽管德国仍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希腊早该退出货币联盟，而且这也将是该国的唯一出路，但政治精英已在一年前放弃了这个选项。

欧元区一时半会儿不会逼迫雅典出局，但另外一个欧元国却可能主动放弃欧元，这便是欧元区的第三个危机源 ----- 塞浦路斯。

据最新民调，67% 的塞浦路斯人赞同退出货币联盟。这个地中海袖珍国的人民对欧元区的伙伴们“怀恨在心”，因为他们要求小小的塞浦路斯筹资 130 亿欧元，作

上述三个国家已是欧元救助基金的老主顾，并且其国民经济的规模在欧元区无足轻重。更令人担忧的是货币联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

为得到 100 亿欧元救济的前提条件。不久前塞国总统求欧元区高抬贵手，遭到拒绝。尼科西亚昔日低利得税、高利息的生财之道被切断之后，新的商业模式还没有找到。这使该国经济如遭霜打。今年 GDP 预计萎缩 8.7%，明年将继续下滑 4%。

上述三个国家已是欧元救助基金的老主顾，并且其国民经济的规模在欧元区无足轻重。更令人担忧的是货币联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评级公司标普刚刚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降至 BBB，只比垃圾高出两级。原因是意大利经济疲弱和企业融资困难。

去年该国经济衰退 2.2%，今年将继续滑坡。欧洲央行的低利率下达不到意大利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债务深重，而罗马政府的融资费用上升直接拖累了企业。目前意大利的债务总额为 2.04 万亿欧元，为欧洲之最，占 GDP 比为 130%，仅次于希腊。新政府既没有改革劳动市场的勇气，也没有前总理蒙蒂理顺财政的雄心。相反，莱塔政府推迟了原定于 7 月实行的提高增值税计划，而且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政党坚决要求取消房地产税。

新政府开改革倒车的后果已经在预算赤字上显示出来。本来罗马很有希望今年将财政赤字降低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 GDP3% 上限以内，但该国统计局 7 月 4 日宣布这一目标已无法企及，预计今年的赤字率将达到 7.3%，高于去年的 6.6%。前总理蒙蒂警告本国政府不得走回头路，国际货币基金前不久也敦促意大利不得再拖延必要的体制改革。而最使罗马政府痛楚的还是标普的降级决定。因为它马上使意大利国债收益率攀升，目前 10 年期债券利息已达 4.5%，与 5 月初相比提高了 0.5%。这对融资需求巨大的罗马政府来说是个可观的负担。

意大利可以说是欧元区的试金石。如果意大利走不出经济低迷和债务飙升的怪圈，投资者又对政府失去信心，那么再大的救助伞也会嫌小。而且受到危及的将不只是欧元区。由于意大利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一旦罗马融资吃紧，其对金融市场的震荡将难以想象。

本想这一次饶过法国、就此打住，却偏偏传来评级公司惠誉将法国信用降级的消息。如此一来，三家最有影响的评价公司都剥夺了法国的最佳信誉级别。由于惠誉很大程度上归法国投资者所有，因此这家公司最照顾巴黎政府情面，给奥朗德扭转乾坤的机会。但一年来，奥朗德本着走一步退两步的原则，好像他有足够的时间让法国人民逐渐正视现实。现在不得不正视现实的是评级公司惠誉。降级的理由是法国的经济前景令人悲观。这使巴黎政府缺少整顿财政的空间，惠誉估计法国明年的债务额度将达到 GDP 的 96%。

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竞争力每况愈下。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的法定最低工资高，工作时间短，退休年龄低，雇员福利高。按理说，推行如此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企业的生产效率应当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过去几年里，法国的经济底气越来越弱，政府却打肿脸充胖子不肯或不敢动摇福利国家的根基。举个例子：法国雇主必须给员工提供免费午餐。这似乎是雇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工会的干部似乎没有人考虑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需要有人买单的问题。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法国不至于在一两年内陷入财政困境，但从中期来说，法国是欧洲货币联盟成败与否的最关键国家。

（作者系德国之声经济部高级编辑，主要关注德国企业和经济及欧债危机。来源：<http://opinion.caixin.com/2013-07-16/100556285.html>）

本想这一次饶过法国、就此打住，却偏偏传来评级公司惠誉将法国信用降级的消息

他们到底有没有动力搞改革？

政府需要等情况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才会做事，否则它不会去做。有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共打下的江山就该它坐，但在现代社会，革命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了，再这么说也没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一论断

文 / 姚洋 采 / 刘一非 徐书明

刘一非：您在 2008 年的时候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助力之一。但也有政治学家分析，政府发展经济是为了寻求合法性，以便于其占有国家资源，因此它还是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而非“中性”的。

姚洋：“中性政府”的确有利益倾向。但是，就社会层面而言，它不与任何社会群体结盟。在有些国家，政府属于某个阶层，它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的，这是中国政府和其它政府一个很大的差别。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自身利益，合法性就是它所追求的利益之一。可是维护合法性有很多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社会中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结盟，用强力来镇压反对力量。很多国家政府都采用这种办法，最后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比如在“非国大”掌权之后，南非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失误，其中一个就是过度地照顾了所谓“以前参与革命的人”，导致很多白人资本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现在发展得很差，根源在于它没有把阶级关系调整好。非国大以前是个反种族隔离的革命政党，执政以后它完全偏向了黑人阶层，但是无论是从教育水平还是管理经验来看，黑人阶层的生产力都有待提高。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享受的权利很少，而白人享受的权利却很多。现在政府要搞种族平权，所以把黑人的待遇提高了，但国力承担不了。以前是绝大多数黑人来支持少部分的白人过很优雅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让全体国民都过上很优雅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它的收入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南非的人均收入可能跟中国差不多，只有白人收入很高，怎么能把整体待遇一下子都大幅提升呢？所以南非工人变得很昂贵，最终结果是工业难以发展，投资者也不愿意来，引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并进一步造成南非恶劣的治安环境。

如果政府不能保持比较中性的态度——此处“中性”是指相对于社会的中性，并不是没有利益诉求——即使它想把这个国家搞好也无法实现，因为它总是要去照顾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这些群体往往是没有生产力的，否则它不会需要照顾。

在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东南亚最典型的的就是菲律宾。五十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它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它的人均收入刚刚三千美元，只有我们的一半。归结来说是它的社会、政治结构抑制了国家的发展。

刘一非：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性政府”有它自己的利益，但是它的利益和国家发展的利益刚好契合。

姚洋：对，这就是奥尔森说的 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张宇燕把它翻译成“包容性组织”，我把它翻译成“泛利性组织”。“泛利性”不是说这个组织与生俱来就是为了国家好，即便组织是一心为公的，组织的成员也未必如此，毕竟组织是由成员组成的，如果成员不是生来为公的话，那么组织就不可能是，只不过是它自身的目标恰好与国家一致。比如合法性，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呢？那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

即使它想把这个国家搞好也无法实现，因为它总是要去照顾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这些群体往往是没有生产力的，否则它不会需要照顾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自身利益，合法性就是它所追求的利益之一。可是维护合法性有很多办法

长刚好跟国家、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组织与国家的利益是互相契合的。

刘一非：在过去，经济增长确实是人民最需要的，但是现在其它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比如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尤其是近年来，环境问题相较于经济发展显得更为急迫。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利益是否就不再与人民一致了？

姚洋：最近跟我跟一个学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一个国家今天是“中性政府”，但是它不会永远都是“中性政府”。

有些群体的生产力比较高，但是这样就会带来不平等，使得另外一些群体要求更多的再分配，就像中国现在的情况，老百姓要求再分配的呼声很高。对此，“中性政府”最初可能会沉默，但是如果民众对“中性政府”的异议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政府可能就会做一点事情；否则，在极其不平等的环境下，穷人群体就要革命，因此政府要做一点再分配，把这些不安定因素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它看没事了，就放松了政策施行力度，不平等可能又要增加，这样社会就会来回震荡。

在过去，经济增长确实是人民最需要的，但是现在其它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利益是否就不再与人民一致了？

刘一非：您能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吗？

姚洋：比如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它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十年前就有人提议了，但政府根本不理睬，因为它计算收入分配不均还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现在基尼系数已经快 0.5 了，可能接近爆炸性的程度，所以要做点事情。

北大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做过两轮全国性调查，这两年间基尼系数的确略有下降，和统计局的数据也能对得上，虽然它（统计局）的数据比我们低，但是趋势是一样的。这几年情况的改善到底是因为政府做了事呢？还是因为经济自己在调整？比如工人的工资在提高，企业的利润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是政府是不是起作用呢？我觉得政府有起作用，比如 08 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加强了对工人的保护，另外最低工资也在不断调高，几乎每两年调整一次，每次都要提约 10% 到 20%。

环境污染也是一样的，和 90 年代末比，我们的环境是在改善的。在北京，90 年代末的环境比现在要差，80 年代的冬天比现在更差，因为一到冬天，全市都在烧煤。现在我们冬天闻到一点煤味就受不了，那时候的人天天闻煤味都没事。

可是环境的治理是需要时间的。比如癌症村现象，因为癌症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发现，所以不可能环境一旦被污染，当地居民马上就得癌症，它需要一段时间。随着环境问题的暴露，老百姓对环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政府就得做一些事情，比如把在环境评估上采用“一票否决制”——不通过环评工厂就不能上马；官员升迁也要看他在环境问题上表现。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在中国 70 个大中型城市里，PM 值比较低的城市，市长、书记升迁的可能性大一些，可见 06 年之后出台的这类环保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政府需要等情况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才会做事，否则它不会去做。

刘一非：当到达临界点的时候，政府就会把影响较大的因素吸纳到激励机制中，通过这种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

姚洋：对，近年大家反应最大的是环境问题，所以政府把环境加入绩效考评。

但是这只对大中型城市有用，对小城市作用有限。所以它也要看老百姓的呼声，因为大中型城市老百姓的收入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随之提升，这对当地政府官员是有压力的。在小城市，老百姓的收入还没达到那一步，大家还要奔收入去，所以地方官员胆子大一点，偷偷排点污也觉得没事。

徐书鸣：您的意思是中国这样的“中性政府”对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能作出更为积极的回应，但是其它国家的政府受制于跟利益集团的庇护关系，因而对社会矛盾的回应性就不足？

姚洋：对，但是我们的回应不是即时的，前提是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否则它也不会回应。其他国家政府因为受制于某些强势集团，所以很难回应。

刘一非：也有一些人提出质疑，认为您的这套理论是在维护政府。

姚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老爱揣摩你的立场、出发点。大家都爱揣摩你的动机，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作为学者，我们的职责是揭示真相，如果这个真相刚好就是“政府做对了”，我们只能承认“政府做对了”，这是作为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如果说我有动机的话，它在于中国人、中国学者一定要有自信。我们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四个自信”怎么体现？我

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再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的排序。别看美国人天天叫喊自由、民主，他们私下讲话都是“美国第一”

也不完全赞同所有“四个自信”——如果说因为要制度自信，我们的制度就不用变了，这个说得有点太满了——但是对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我还是非常赞同的。对中国走过的路，我们要有自信，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总结方法。左派说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右派会说因为我们全面地学习了西方、改革开放。我觉得这两者都不可取，左派等于什么也没说，右派等于是投降。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新的东西，至少起点、走过的路与其它国家有所不同。

怎么总结我们的中国道路呢？我有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我们要从中国道路里总结一些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要有这种自信。左派的问题在于他们否认普世价值，中国的道路里是能总结出普世价值来的，而且要能以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说出来。这点算是我的动机之一。

刘一非：您觉得这种正面总结的意义在哪里？

姚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全世界哪个国家有一个家庭的谱系是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只有孔子，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文明的生命力如此强大，中国应该有信心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毛泽东说“中国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要有思想上的。政治家被日常工作所左右，做不了这件事，学者就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现在批判制度的学者有很多，但是能正面总结自己的人太少了。我们被左右之争所绑架，有些人变成极左，有些人变成极右，极左的老强调一些过时的东西，极右的人就强调我们要向西方全盘西化。

我们是不是要多一些中间的人群来正面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的经验推向世界？这样更务实，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中华民族更有利。

刘一非：您是立足民族的视角？

姚洋：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再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的排序。别看美国人天天叫喊自由、民主，他们私下讲话都是“美国第一”，绝对不会说优先考虑中国，美国总统明确说“美国的利益是他的第一利益”。

但是国内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我经常去开国际关系的会，听会上的美国人发言，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每个美国人尤其是精英分子骨子里都是民族主义者，要站在本国立场说话。

不仅如此，美国精英还觉得在道德上要高别人一等。他们永远是站在中国人的上面说话，这是极其恶心的。整个世界是大鱼吃小鱼的格局，我们要等到世界大同的那一天再来谈国际主义。奥巴马明确说美国不能做第二，可是中国也不想做老三啊！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抱负的民族，两千多年的文明，难道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有这个抱负吗？

我在麦迪逊读书的时候，每年7月4日晚上他们都要放焰火，很多人都会带着

收音机来放美国国歌（因为那里没有高音喇叭），当七点钟开始放国歌的时候，所有人起立，手放在胸口，把国歌听完，然后看着战斗机飞过。这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它并不比中国弱。只是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它没有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变成人民性格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估计本届政府重点不会在直接再分配上

刘一非：刚刚说到再分配的问题，您曾撰文分析中国最近的经济的发展，认为它比较符合“华盛顿共识”，其中有一条就是较少的政府再分配。可是现在要求再分配的呼声很高，你对此有何看法？政府下一步又会采取什么措施？

姚洋：我估计政府不会出台很具体的政策，再分配问题是上一届政府说得比较多的问题，从现在的数据看，基尼系数在下降，我估计本届政府重点不会在直接再分配上。

但是它做的很多其它事情可能会改善再分配，比如通过城镇化、解除户口的约束，让更多人到城市里来，这对改善收入分配很有好处，毕竟农村收入跟城市的差距还是三倍以上。不仅如此，农民流向城市——这里就业机会更多，老百姓的福利改进可能会更大——使得留守儿童问题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中国有几千万留守儿童，他们是牺牲的一代人，通过改革户口制度，他们能来父母所在地上学，这个群体福利的改进是没办法度量的。

所以我想本届政府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间接地改进再分配上，因为直接再分配的推行很困难，你能要求私人企业、外企必须支付员工多少工资吗？显然是不可行的。

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规定要同等对待派遣工人，我觉得是对的。现在很多国企都在用派遣工人，通过劳务派遣规避法律规定，只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现在法律说不行，劳务派遣的工人也必须同等对待，这样收入分配也会有一些改善。对于新规定，网上有些人恨不得开始要打土豪了，这个显然是太过偏激了。

徐书鸣：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的体制已经是僵化不能改了，只能爆发革命，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姚洋：有些人对现实彻底失望，只等着革命的那一天。但是革命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好事，我们还是希望平稳地过渡，比如再用十年、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平稳过渡到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我们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找到一条过渡的路，架起一座桥并让政府走过去。当然有人说政府就不会走，因为利益集团已经把它绑死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告诉它当前的道路是不行的，不改变就真要爆发革命了。

我的辩论逻辑是政治体制方面不松动，经济结构要做调整也比较困难，因为政府不对老百姓负责任，调结构就会步履维艰，所以为了调整结构你也应该引进更多的

革命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好事，我们还是希望平稳地过渡，比如再用十年、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平稳过渡到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

的民主，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说话空间，这样老百姓的福利才会有改善，社会也就稳定了。从这个逻辑推，政府是不是更容易接受呢？

但政府的确什么都不改怎么办？政治上没有任何动作会让知识分子失望，也让老百姓对福利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失望，两处一合拢就变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可能会发生“阿拉伯之春”，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应该想一下我们下一步怎么推进改革。

徐书鸣：您认为当下政府推行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姚洋：它的动力还是合法性问题，最终要找到一个合法性的依据。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要靠不断地表现获取政权支持，这是非常累的。

有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共打下的江山就该它坐，但在现代社会，革命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了，再这么说也没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一论断，还得要找到一个程序的合法性。为什么我主张要有《党与国家关系法》？因为有了法律根据，党就有了合法性。

怎么把党纳入到宪法的框架里呢？首先让党受宪法的制约，在这个条件下能把宪法所赋予的所有权利都实现，中国的民主也就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就像日本自民党执政时期也有一个宪法体系，谁也不能超越宪法，所有人都在宪法的框架里活动。但事实上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从 45 年一直到 90 年代初，它执政了 50 多年，我们也是有可能的。

（姚洋，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本文有删改。

来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3071887898.html)